



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

——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李世愉^{1,2}

(1.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关键词:土司学;必然性;必要性;演进历程;发展趋势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章编号:1007-4074(2017)04-00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35)

作者简介:李世愉,男,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引用本文:李世愉.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4):6-12.

随着土司研究的深入,构建“土司学”再次成为热点。它预示着备受关注的土司学逐渐成熟。可以说,这是土司研究飞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文试图从土司研究的发展,来论证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促成“土司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学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

一、如何理解和认识“土司学”

“土司学”的提出已有多年,但在土司学界似乎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有必要先讲清楚,什么是“土司学”,以及它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一)土司学的定义

我们认为,构建土司学,需要对土司学的定义

进行论述,同时对其研究范围加以界定,以期形成共识。

首先要说明的是,土司学不是一个学科,它与历史学、生物学、物理学等是不同的,它只是一门专学,或者说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具体而言,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的所有内容的一门专学。毫无疑问,土司学是一个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构建土司学,更多强调的是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当然,就目前状况而言,土司学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研究领域,一个崭新而欠成熟的研究领域,但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

(二)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与区别

随着土司研究的兴起与不断深入,学者先后归



纳总结出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两个概念,并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现在又提出了土司学。准此,就有必要搞清楚三者各自的内涵和研究对象,否则,构建土司学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认为土司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那么构建土司学就成了无的放矢。我们认为,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即共同点,也就是三者的研究对象都离不开“土司”。然而三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反映在它们各有自身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土司制度的研究范围,是元明清三朝推行的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各个方面,强调的是制度层面的研究。作为土司制度的研究,注重的是土司职衔与品级制度、承袭制度、分袭制度、印信制度、朝贡制度、赋税制度、奖惩制度、抚恤制度、教育科举制度、司法制度、改土归流政策、革除土司安插制度、分别流土考成制度、流土并治政策等各项与土司相关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的确立、发展、演变,以及推行实施的状况。制度层面的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没有制度层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便难以深入。当然,制度层面的研究绝不应停留在对制度的简单、静态的描述上,而是要注重研究各项制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特别是在实施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而做出的调整,以及这些制度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效果和造成的影响。

土司文化这一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以往使用中,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相对于土司制度而言,土司文化应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是指土司制度在创建和推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的产物,植根于土司制度。在土司地区,凡属由于推行土司制度而产生的各种影响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土司文化的表现,如土司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道德信仰、价值准则、行为方式、社会心态、文学艺术等诸多精神文化领域展现的新面貌,均构成了土司文化的内涵,也是我们研究土司文化的主要内容。其他如土司地区的官署建筑、碑刻牌匾、雕塑印章、谱牒家传、服饰饮食、节庆习俗、民间传说等,也是土司文化研究的对象,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被挖掘出来。

土司文化这一概念提出后,土司研究实际上分成了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两大部分。二者的研究对象各有侧重:土司制度的研究关注的是制度的制定与推行,进而了解土司制度的顶层设计及其内部

各个环节的衔接,以及中央政府在管控土司地区的意图和实践;土司文化的研究则侧重于土司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和引发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从而了解土司制度推行的效果和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文化积淀。当然,研究土司制度必然会涉及它推行的效果和影响,研究土司文化也不可能不涉及土司制度的内容,但毕竟二者的侧重点是有区别的,不可相互取代。

土司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与土司相关的所有问题,其研究内容非常广阔,具有巨大的时空构架和宽广的学科范围。由于土司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很多学科加入到这一研究中来。就目前的情况看,很多研究内容虽与土司有关,但很难纳入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研究范围。比如“土司考古”的提出,“土司历史地理”研究的起步,土司遗址的研究与保护,以及土司文献的研究,土司人物的研究,土司现象的探讨,土司地区民族成分、人口的研究,土司地区的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的研究,土司地区方言的研究,等等。这些内容无疑应纳入土司学的研究范围。显然,这些内容都脱离不开“土司”的存在。

土司学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土司制度,也会涉及土司文化,但土司学并不是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总和,它是土司研究的延伸和拓展。土司学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研究。土司学更强调土司研究的广博性,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构建土司学必然会对土司研究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理论化。

二、“土司学”产生的必然性

土司学的提出,反映了土司研究的不断深入。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有其必然性。应该说,它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对现实研究状况的客观反映。

(一)土司称“学”的要件

土司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能否称“学”要看是否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内在因素,一个是外在条件。现在动辄称“学”的现象很普遍,但是真正被学术界认可的并不多,关键在于它们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称“学”的条件。

所谓内在因素,是指它的研究对象要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这是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的基础。土司研究现在成为热点,受到各

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之后,许多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土司制度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智慧,它“创造性地构筑了一种区域社会新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现实借鉴,都具有不可多得的标本意义”。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土司制度与其他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不同,土司与一般的行政官员也有明显的区别。由此而带来的土司地区的各种变化,都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土司研究的广博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不是单一学科能够解决的。至于土司研究的现实性更为突出。土司制度存在了六百余年,成为联系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纽带和桥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土司制度中所体现的“齐教修政”“因俗而治”的思想,更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借鉴。毫无疑问,土司研究领域的本身是具备了称“学”基础的。

所谓外在条件,是指这个研究领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有长时间的研究进程,要有相当数量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要有相当规模的各个梯次的研究队伍,更重要的是它始终在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离开了这一点,即使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具备了称“学”的条件,也不可能称“学”。以土司为例,数十年前,在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是不会提出“土司学”的。对此,下文将详细论之。

大凡某种学问或学术研究领域得以称“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研究深入了,成果多了,影响大了,自然而然地被称之为“学”,可谓顺理成章,实至名归。如“红学”、“敦煌学”、“徽学”等即可归之于此。另一种情况则是学者根据现有研究的发展趋势,先构建“学”,并努力为之奋斗,最终被学术界认可,科举学即属于这种情况。1992年,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撰写了《“科举学”刍议》一文,提出了建立“科举学”的初步构想;随之又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科举学得以成立的原因。此外《高教自学考试》月刊于1998年开辟了“科举学”丛谈系列论文栏目,《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也设立了“科举学”笔谈专栏。与此同时,科举的研究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2005年,刘海峰《科举学导论》一书出版,标志着“科举学”的成熟,并为海内外学者所认可。“土司学”如同“科举学”一样,也是根据研究发展的趋势提出的,但能否为学术界所认可,还要看我们的工

作。对此,我们是有信心的。借用鲁迅先生的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可以说,世上本无所谓学,研究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学。

(二)土司研究的演进

前面我们谈到,土司能否称“学”,其外在条件取决于它的研究状况。从土司研究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这一研究正在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土司学的构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土司研究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及民国时期,这是土司研究的初始时期。此时的研究突显出对国土安全的关切,以及对时政问题的关注。清末发生在云南的“片马事件”,成为当时关注的重点。片马地区一直是土司管辖之地,因而引发了人们对云南边境土司的思考。1908年,《云南》杂志社干事李根源发表了署名雪生的《云南之土司》一文。通过对历史的追溯,阐述了云南土司领地的形成,有力证明了这些土司辖区属于中国的领土。进入民国,一些有关土司文章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土司地区的关注。在民国行政区划的改革中,针对土司问题,学者或参与调研,或发表见解。为了正确认识土司问题,从制度层面了解土司,学者提出了“土司制度”这一概念,从而使“土司制度”作为特定的政治制度用语使用至今。在这一时期,众多报刊相继发表有关土司的文章,有力推动了土司研究从关注现实转向了学术研究、理论探讨。如余贻泽的《中国土司制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土司制度的专著^[1]。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一文,对土司制度的源流、历代政策、世袭传位、领地性质,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其他学者的文章,还涉及“土司”概念的界定、土司的分类,土司制度的性质、特点,以及土司制度的起始时间等。这标志着土司制度学术研究体系的初步形成。

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研究内容较为零散,但许多学者从关注时政出发,所研究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对残留土司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因而使这一研究带有很强的时代感。这种对策性的研究,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第二阶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9年,这是土司研究的相对停滞期。由于受特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土司逐渐淡出学者的视野,以致土司问题的研究几乎沉寂了30年。这一时期发表的论

文仅有十余篇，出版的专著只有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一书^[2]。这一时期关注的重点在于探讨土司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以及土司族属的民族识别。另外，杜玉亭的两篇文章，及江应樑的专著则探讨了土司制度建立的时间、土司制度的特点，以及对“土官”、“土司”等基本概念的辨析。这些研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第三阶段，自1980年至上世纪末，这是土司研究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显然受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繁荣的影响和推动，参与研究的人数大增，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这20年间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研究专著8部，其中以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3]、龚荫《中国土司制度》^[4]、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5]三部书影响最大，与上述余贻泽、江应樑的专著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有关土司制度研究领域带有标志性的五部重要著作。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土司制度的创立发展过程的探讨，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对土司制度是腐朽落后制度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纠正，对这一制度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给予肯定。二是对改土归流的研究，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了在实施过程中的失误。三是对区域土司的研究。这是了解土司制度实施状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研究成果涉及土家族土司、壮族土司、以及区域性土司，如鄂西土司、西北土司等。这一时期，为了适应研究的需要，提出了“土司文化”的概念，扩大了土司研究的范围；有关土司资料的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全国性的土司问题研讨会也召开了几次，扩大了土司研究的影响。总之，这一时期的土司研究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稳定的研究队伍。

第四阶段，自本世纪初至今，土司研究臻于鼎盛，大有成为显学之势。特别是2015年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标志着土司研究的社会意义得以大幅度提升，也给了土司研究者以巨大的鼓舞，使土司研究更上一层楼。

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队伍迅速壮大。许多原来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加入到土司研究的行列；在校研究生也把土司问题作为研究方向。本世纪以来，全国高校有近百名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专门研究土司问题。吉首大学、长江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更有意识地引导培养

本科生关注土司问题。二是研究成果丰硕。十余年内出版了大量研究专著，内容涵盖西南、中南、西北所有的土司地区，其数量超过前三个时期的总和。尤其是近几年，每年都有六七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千余篇，尤其是近两年，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200篇以上，其中多有创新之作。《青海民族研究》《长江师范学院学报》《遵义师范学院学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先后开设土司问题研究专栏，有力地推动了土司问题的研究。三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学者注重将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相结合，探讨历代治边思想的发展与变化，重点探讨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问题、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对土司制度的历史评价有了新的定位。相应的理论问题也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土司研究的空间也不断拓展，不仅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土司问题均有涉及，各地区的土司也纳入研究视野。凡设有土司的省份，都有相应的研究专著出版，并有大量的论文发表。对新史料的发掘和使用更加普遍，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明显提高。近几年，仅《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有关土司研究的文章就有5篇，摘要转载的更多。四是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定期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推动土司研究的深化，培养研究人才，吉首大学于2004年成立了“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长江师范学院于2007年成立了“西南地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遵义师范学院于2014年共同创办了“中国土司文化研究基地”。2009年，在广西忻城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司文化研讨会，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成臻铭提出了构建“土司学”的设想。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成为推动土司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土司研究学术团体，定期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性的土司文化研究团体已于2013年批准成立，全称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于2011年首度召开，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每次会议，都成为一次宣传会、动员会，并在当地掀起一股“土司热”。五是土司研究得到有关地方政府的关注和大力支持。由于土司问题研究对于今天民族地区的建设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而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广西忻城县、云南景东县、梁河县等在原土

司衙门开设了土司博物馆,发动基层文化工作者宣传、研究土司文化。随着土司遗址申遗活动的开展,湖南、湖北、贵州一些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召开研讨会,聘请专家进行前期论证,向干部群众讲授土司文化的基本知识。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后,上述地区掀起了研究、宣传、弘扬土司文化的热潮,其他地区也积极跟进,保护、利用土司文化遗产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这一热潮,又进一步激发了学者强烈的使命感,调动了他们深入研究的积极性。

从上述土司研究的演进可以看出,土司称“学”的外在条件已经具备,可以说,构建土司学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土司研究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土司学”的提出是适时的,也是有前瞻性的。尽管“土司学”的构建尚在进行中,但从土司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土司学”已经呼之欲出。

目前土司研究的发展趋势具有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整体研究状况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且后劲十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料发掘整理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今年结项,上千万字的土司资料已待整理出版,其中分量最大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土司档案,大多数是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历代方志土司资料辑录》于最近出版。还有许多单位和学术团体也加入了土司资料收集整理的行列。这种基础性的资料工作,必将为推动土司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相当一批学术团体和研究部门制定了土司研究的长远规划。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计划在十年内组织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完成《中国土司制度通史》《中国土司大辞典》《中国土司印信图录》《中国土司地图集》。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制定了土司文化研究的规划,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目标,并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准备在三到五年内出版《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丛书》,分五个系列,二十几个专题。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决定出版《土司文化研究丛书》,并已付诸实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支持的湖南永顺县中国

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广西忻城县中国土司文化研究基地等单位,为配合土司遗址的保护利用,都制定了研究、宣传和出版计划。永顺县还提出,要将老司城遗址办成土司遗址保护中心、土司文化展示中心、土司文化研究中心。上述规划和目标是土司研究可持续发展和提升整体研究水平的有力保证。

三是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的课题指南,都有关于土司研究的选题。如2017年的课题指南就有:“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比较研究”、“明清西南地区开发研究”,与土司问题相关的还有“明清民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历代边疆治理与族群认同研究”、“近代以来中外有关领土主权和疆界划定交涉研究”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术研究导向作用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课题指南上述配置,必定会促进土司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一些地方政府也准备对当地的土司文化遗产做普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保护和利用。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更多学科的研究者开始向土司研究转向,如考古学界有人提出,要重视“土司考古”。可见,土司研究的前景十分看好,曾经冷清的土司研究成为显学指日可待。

第二、研究进一步走向理论化、综合化。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区域土司研究、个案研究以及单一的制度研究。近几年来,情况已有明显变化,如对土司制度实质的重新探讨,对土司制度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对土司地区国家认同的研究,对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关系的阐述,等等。此外,对土司制度基本概念的辨析,对“土司文化”定义、内涵的讨论,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偏差的纠正等,都反映出土司研究正向理论化方向发展的新动向。

土司研究向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例如对区域土司的研究,学者既注重对制度层面的探讨,也关注其中所涉及的政治学、民族学、生态学、人类学、教育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土司遗址申遗活动开展以后,为了给申遗工作提供学术支持,学者有组织地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如吉首大学组织20余位专家学者,以团队的方式分工协作,进行综合研究。他们以老司城遗址为研究对象,全力攻关,最终完成了《土司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讨了永顺土司的兴衰史,对永顺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军事编制、土家族文化、建筑布局、文学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称得上是永顺土司的百

科全书,堪称土司研究中跨学科合作的典范。贵州、湖北等地,也组织专家学者对该地土司遗址、土司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举办相应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种综合性研究蔚然成风,必将对土司研究的架构和研究平台提出更高要求。

第三、分散研究的局面正被打破,学科之间的交流渗透逐渐成为主流。以往的土司研究都是各学科的单兵作战,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长此以往,自为藩篱,必然会制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各学科虽自有优势,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短板,各学科的专家往往从自身的特点和专长出发,很难兼顾相关学科所具有的优势。如历史学界多关注制度层面的研究,并偏向于对此进行断代研究;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则关注单一民族或地区的研究。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要求看,都有不足之处。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往往是“老死不相往来”,缺乏必要的沟通。所幸随着土司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申遗活动的开展,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各方面专家学者合作的团队式的研究方式,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像吉首大学那样聚集各个领域和学科的专家合力攻关,更可以解决系统性的重大课题。每年召开的“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更为这种合作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成为构建“土司学”的重要保证。

综观土司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土司研究从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转向全方位的研究,从单一学科的研究向多学科的渗透,从实证研究向理论建构的提升,都清晰地表明土司研究正在走向成熟,土司学的提出和建构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也是各界从事土司研究学者的共同心声。

三、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应该指出,土司称“学”的必然性,已经蕴含了土司学的必要性,但过细考量,两者和而不同,仍有必要再作阐述。

(一)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土司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吸引了更多学科的专家学者乃至地方文化工作者加入土司研究的行列。以往沿用的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内容区分已不能适应当前研究的趋势。目前土司研究正向纵深发展,急切期待创新,与土司研究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土司的地域分布,土司辖地、

治所、疆界的确定,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人口数量和结构分布、民族成分、民族语言、生态环境、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土司文献、土司考古、土司遗址、土司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利用,乃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所提出的“新辟苗疆”的相关研究,等等,都急切需要一个更大的、创新型的平台,将各路研究人员有效地组织起来,采撷各学科的专长,融会贯通。这是土司研究新的生长点,我们只有成功构建土司学,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目前,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土司学的内容,促成了它的逐渐成熟,而土司学的构建,又可以为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

(二)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

由于学术研究发展趋势的指向,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已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手段,研究项目以学科为主开始向问题为主转变,我们必须依据学术发展的新趋向,调整和重组土司研究方向和课题配置,从继承拓展走向创新。如学术界在贯彻中央“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时,就不可能局限在单一学科进行思考和实施。土司学的创建,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根本性的转变。上文提及的“新辟苗疆”问题,就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协作才能完成的项目。清雍正朝在改土归流的同时,大力开辟苗疆的重点,就是今天贵州的黔东南地区。研究黔东南地区二百多年的发展,对于贵州的建设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生态学的联合攻关。这样的组合拳,只有在“土司学”提供的平台及其架构的宏观导向中才能圆满完成。

总之,构建“土司学”作为土司研究的创新,就是努力改变以往各自为战的状况,不仅是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而且是多学科的融合贯通,贯穿土司研究的各个层面,成为一个有机运作的系统工程,从而获得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优化效果。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我们这种创新努力能够得学界同仁的响应和指导。我们相信,通过土司学界的不断努力,土司学必将有实至名归的那一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 [1] 余贻泽. 中国土司制度[M]. 台北:正中书局,1944.
- [2] 江应樑. 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 [3] 吴永章. 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M]. 成都:四川

民族出版社,1988.

[4] 龚荫. 中国土司制度[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5] 李世愉. 清代土司制度论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陈 伟)

The Study of Tusi: Deserving a Right Name

——On the Inevita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Tusi

LI Shiyu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study of Tusi, Tusi system and Tusi culture. The study of Tusi is a specialized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Tusi system. Whether a research field could be called a study or not depends on its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Being important, unique, extensive and realistic in its research object, the research of Tusi has a profound foundation to form a study. The status of Tusi research, whether in terms of research history or development tendency, has shown mature external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usi will appear inevitably, which calls for a specialized study and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the study of Tusi; inevitability; necessity; evaluation course; development tendency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拓展、提升办刊特色,本刊将加大对新辟特色栏目“土司文化研究”的建设力度,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将该栏目建设成为国内土司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

“土司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指定特色栏目。栏目主持人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世愉先生。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将主要围绕以下 4 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为参考选题方向(其他选题方向的稿件,亦欢迎大家积极支持),征集稿件:(1)理论与方法:土司学的建构;(2)土司制度的终结;(3)土司的地域分布;(4)土司制度的实质。

诚望广大专家学者积极撰稿支持。该栏目稿件,本刊将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信箱:jsdxxb@qq.com;电话:0743-8563684;网址:skxb.jsu.edu.cn;微信号:jsdxxb

吉首大学学报编辑部